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四辑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张伟 主编

骆雨祥 题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四辑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海洋出版社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 第4辑/张伟主编.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27 - 7953 - 5

I. 浙… II. ①张… III. ①海洋—文化—浙江省—
文集②沿海经济—经济发展—浙江省—文集 IV. ①P722. 6 - 53
②F127. 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1879 号

责任编辑: 陈莎莎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441 千字 定价: 52.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编委会

主 任： 郑孟状

主 编： 张 伟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慕民 严小军 张 伟 郑孟状 郑曙光

范 谊 段汉武 钟昌标 蔡先凤

前 言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本刊物的宗旨是围绕浙江海洋经济与管理、浙江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海洋文化三个研究方向,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对策性研究成果,在促进基地建设、推动学术交流的同时,全面为浙江省实施海洋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服务。

本辑共收录论文 36 篇,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研究;既有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策性研究,内容涉及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对外交流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各个方面。收录的论文除了基地研究人员研究课题成果外,也有国内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海外研究人员的部分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有关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

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加之编纂时间仓促,文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编委会

2010 年 9 月

目 次

百济出土六朝青瓷与江南葬制相关问题研究	[日] 门田诚一撰 刘恒武译(1)
宁波商人虞洽卿与宁绍轮船公司	[日] 松浦章撰 孔颖译(13)
绿色港航的国际发展趋势及浙江省的应对建议	严小军(30)
我国海洋旅游开发中的安全问题探讨	郑向敏 范向丽(37)
宁波市海洋旅游产业空间布局与发展研究	苏勇军(43)
浙江海岸带文化景观形成的地貌环境因素分析	王杰 李加林(50)
浙江海洋文化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李加林 王杰(55)
海域使用权基本问题探讨	蒋帅(62)
《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前景分析及中国的对策	闻银玲(72)
我国海洋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探讨	沈永明(82)
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及产业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燕小青 刘和勇(86)
用于海岸带重金属生物修复的经济海藻筛选与评价	吴小凯 骆其君(93)
管理成本在海岸地区保护计划中的应用——以盐城自然保护区为例	葛云健(103)
海岛风能海水淡化组合体系研究	任典勇 施慧雄(109)
江苏灌西滩涂开发利用模式演替过程分析	沈永明(121)
海洋渔业的政策性保险之路——“宁波模式”的经验分析	沈圣 俞雅乖(126)
港口与腹地经济关系研究——以宁波港为例	丁井国 钟昌标(133)
港-城界面的演变及其空间机理——以宁波为例	庄佩君 汪宇明(141)
宁波海洋产业结构分析与预测	张海翠 王爱民 胡求光(153)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对宁波港口经济发展的影响	王晓萍(161)
两岸四地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分析:1997—2008年	梁振 钟昌标(169)
中日铜镜文化交流述略	陈慧智 郭万平(178)
再论唐代明州有无设立市舶司问题	娄娜(187)
宋朝对日陶瓷贸易的两个问题——以鸿胪馆和博多遗址群出土粗制陶瓷为例	黄建秋(192)
明代葡中冲突交流与西洋火器的传入中国	陈鑫磊(197)
洪任辉事件与清代浙江海洋政策探微	周慧丽 王万盈(204)
清代前期宁波地区的海禁——以《清实录》为中心的探析	白斌(214)
唐宋时期宁波人对海洋生物的认识	张如安(222)
浙东古海塘的修筑及演变	刘丹(230)

浙东方言与海洋文化探析	赵质群	周志锋(237)
海错诗浅论	徐欢欢	李亮伟(243)
真幻交织的海洋吟唱——论宁波古代海洋诗词的实虚两境	贺 珊	(252)
简论海洋文化对宁波城市发展的影响	张 伟	苏勇军(257)
论明清浙江海洋社会形成的精神基础——以妈祖信仰为主的考察	魏 亭	(263)
海上名城研究——定海古城文化的生态解析	王文洪	(269)
“边缘-前沿”视角下的舟山历史	冯定雄	(283)

百济出土六朝青瓷与江南葬制相关问题研究

门田诚一¹ 撰 刘恒武² 译

(1. 日本佛教大学史学科 2.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朝鲜半岛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六朝陶瓷遗物,反映出中国六朝时期江南地区与朝鲜三国时代百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在百济故地所出中国陶瓷器之中,青瓷羊形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非实用性器物。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青瓷羊形器与江南地方性葬制有着密切关联,而且带有明显的江南土著文化色彩。百济地区所出中国青瓷羊形器也仅见于偏离政治中心的法泉里,这一现象昭示出百济基层地方势力与江南土著集团之间接触往来的历史可能性。

关键词 百济 六朝青瓷 江南葬制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积累,百济故地的墓葬与城址发现有中国六朝陶瓷器的考古学信息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围绕同类器形对比研究、类型学角度的年代考证以及出土资料综合考察等等课题展开。而关于这些遗物出土的具体历史意义,尤其是它们所关联的对外交往史实,则鲜有研究者论及。

本文以百济墓葬出土的中国六朝陶瓷器中的青瓷羊形器为考察重点,试图弄清百济故地的墓葬营造者埋纳这些器物的观念背景。首先,本文根据近年发掘报告,对百济故地三国时代出土中国陶瓷器的城址、墓葬地点作一介绍,然后在整理相关论见的基础上,阐发百济政权以中国陶瓷器的赐授为手段强化地方统治、区别葬制等级的具体状况。

二、百济故地出土的两晋南朝陶瓷器相关成果梳理

关于朝鲜半岛采集或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迄今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与考证。就发现于墓葬、城址而且具体出土状况清楚的资料而言,朝鲜三国时代遗址所出中国陶瓷占据最大比重。自1972年百济武宁王陵发掘以后,朝鲜三国时代遗址出土中国西晋、东晋以及南朝陶瓷器的考古信息,逐渐广为人知。近年,以百济初期王都所在地——首尔为中心,相关考古资料在数量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在对三国时代朝鲜和同时期日本进行探讨之际,必须言及的是,近年文献史学研究成果

表明,出于权力正当化的需要,在当时朝鲜、日本已经存在以中国王朝册封体制为基础的官爵授予活动。如果以出土资料为依据考察当时中国王朝与东亚诸国的国际交流,那么就需要以朝鲜三国时代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为线索,建立一个基础性的认知体系。

在百济故地,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包括:梦村土城(首尔特别市江东区)^①、风纳土城(首尔特别市)^②之类的城址;石村洞古坟群(首尔特别市江东区石村洞)^③、法泉里二号坟(江原道原州郡)^④、花城里古坟群(忠清南道天原郡)^⑤、龙院里遗迹^⑥、笠店里一号坟(全罗北道益山郡)^⑦之类的坟墓;竹幕洞遗址(全罗北道扶安郡)^⑧等典型的祭祀遗迹。此外,还有自作里遗迹^⑨、神衿城址^⑩等居住遗址以及文化堆积层。由此可知,中国陶瓷出土于各种属性不同的遗迹。在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遗址中,武宁王陵(忠清南道公州市)^⑪、扶苏山城^⑫、东南里遗址、王宫里遗址(全罗北道益山市)^⑬也发现有中国瓷器。在1990年以降开展的研究中^⑭,从汉城时期到熊津时期、泗沘时期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得到了全面的、量化的考察^⑮。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百济陶器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依据。

就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研究而言,先前学界主要以古坟出土资料为考察对象,对两晋南朝瓷器输入百济地区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于两晋南朝瓷器甚至流入到了百济政权基层地方小型古坟这一现象,一种意见认为,这反映出基层地方势力与南朝已有直接的接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一种间接传播的结果。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学者金元龙指出:“这些中国瓷器首先通过4世纪留居于乐浪、带方故地的华裔住民集团与中国南方的海上交往被输入到大同江地区,之后又在贸易或战争

① 梦村土城发掘调查团:《梦村土城发掘调查报告》,1985年;金元龙、任孝宰、朴淳发:《梦村土城——东南地区发掘调查报告》,首尔大学校博物馆,1988年;金元龙、任孝宰、朴淳发、崔钟泽:《梦村土城——西南地区发掘调查报告》,首尔大学校博物馆,1989年;定森秀夫:《关于韩国首尔地域出土三国时代土器》,《生产与流通的考古学》,《横山浩一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I》,横山浩一先生退官纪念事业会,1989年;龟田修一:《从考古学看百济前期都城》,《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24号,1987年。

②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风纳土城I——现代连合住宅以及1号地区再建筑敷地》,2001年;权五荣:《风纳土城出土外来遗物探讨》,《百济研究》36号,2002年。

③ 金元龙、林永珍:《石村洞三号坟东侧古坟群整理调查报告》,首尔大学校博物馆,1986年;首尔特别市石村洞发掘调查团:《石村洞古坟群发掘调查报告》,1987年。

④ 金元龙:《原城郡法泉里石椁墓与出土遗物》,《考古美术》120号,1973年;三上次男:《汉江地域发现的四世纪越州窑青瓷与初期百济文化》,《朝鲜学报》81号,1976年;国立中央博物馆考古部:《法泉里I》,2000年。

⑤ 金吉植、南宫丞、李浩炯:《天安花城里百济古坟》,国立公州博物馆,1991年。

⑥ 公州大学校博物馆等:《龙院里古坟群》,2000年。

⑦ 韩国文化财研究所:《益山笠店里古坟发掘调查报告》,1989年。

⑧ 国立全州博物馆:《扶安竹幕洞祭祀遗迹》,1994年。

⑨ 成正镛:《百济与中国的贸易陶瓷》,《百济研究》,38号,2003年。

⑩ [韩]忠南大学校博物馆:《神衿城》,1994年。

⑪ 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编、永岛晖臣慎译:《武宁王陵》,学生社,1974年。

⑫ 扶余文化财研究所:《扶苏山城——发掘调查中间报告》,1995年。

⑬ 扶余文化财研究所:《王宫里遗迹发掘中间报告》,1992年。

⑭ 李钟玟:《百济时代输入陶瓷的影响及其在陶瓷史上的意义》,《百济研究》,27号,1997年;李兰英:《百济地域出土中国陶瓷研究——以古代贸易陶瓷为中心》,《百济研究》,28号,1998年;金英爱:《百济时代中国陶瓷的输入与仿制》,《百济文化》,27号,1998年。

⑮ 成正镛:《百济与中国的贸易陶瓷》,《百济研究》,38号,2003年。

过程中进一步流入韩国中部。”^①

百济王权与两晋南朝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从武宁王陵出土的大量南朝瓷器上得到明证,而且在武宁王陵墓室建筑上也有所反映。武宁王陵砖室墓本身的营造以及墓砖纹饰的制作,都是凭借中国技术完成的。^②另外,武宁王陵附近的宋山里六号坟出土了刻有“梁官瓦为师”铭文的墓砖。根据文献记载,公元541年,继武宁王之后在位的圣王(圣明王),曾向南朝梁请求赐予经卷、工匠、画师等,并得到了梁帝的允可^③。既然南朝曾向百济派遣过技术匠师,那么,武宁王陵和宋山里古坟群等砖砌坟墓的结构和出土遗物中包含着中国南朝的技术因素及其影响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界一般根据《三国史记》等文献的记载认为,百济与东晋的交往始于近肖古王时代、公元372年百济的遣使入贡^④。然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诸说纷纭,事实上,《晋书·马韩传》、《晋书·世祖武帝纪》都记载有马韩向西晋入贡之事,可以肯定,在百济之前的马韩时期,朝鲜半岛西南的政权已经与中国西晋王朝有了直接的交往。马韩、百济与两晋南朝的直接交往,从文献史料和出土遗物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明证。特别是自4世纪后期以来,百济接受东晋南朝的官爵授予,与中国往来频繁。如果认为百济已经建立了对华直接联系,两晋南朝陶瓷器却仍以间接的渠道流入百济势力范围,那么,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具体的、积极的史学阐明。

东晋与百济等韩国南部之间存在直接交往的观点,是三上次男和小田富士雄提出的^⑤。然而,即便赞成两晋南朝陶瓷器直接流入百济地区的意见,也需要思考另一个衍生问题:中国陶瓷是如何扩散到修筑小型古坟的地方势力层面的?关于法泉里古坟、花城里古墓等埋葬设施中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些瓷器是通过与东晋有交往关系的百济王权间接获得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修筑法泉里古坟、花城里古墓等墓葬的地方势力与东晋有直接联系,并直接从东晋获得了这些瓷器。这一课题于1988年由权五荣提出^⑥,迄今暂无专论探讨。

应该指出,我们没有必要将百济向东晋遣使入朝的时间限定于公元372年以后。按照常见的一种推定意见,石村洞八号土坟墓的被葬者并非王族,而是中央贵族,法泉里古坟、花城里古墓的被葬者则应是与中央没有谱系关系的地方势力。循着这个思路还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点,“这些古坟出土的东晋物品应是百济最高支配层(王室)的赏赐品”。进而言之,“法泉里和花城里发现的青瓷和鏃斗等东晋物品不仅是百济、东晋双方交往的证据,也是百济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政治关系的产物”。另外,有人援用小林行雄的三角缘神兽镜分配理论,将4世纪百济政权赐授青磁、鏃斗等东晋制品的行为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分配以相同的

① 金元龙:《中国新出考古资料二种》,《考古美术》,121号、122号,1974年。

② 冈内三真:《百济武宁王陵与南朝墓之比较研究》,《百济研究》,11号,1980年。

③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圣王十九年”条记载:“王遣使人梁朝贡,兼表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从之。”

④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近肖古王27年”条记载:“春正月,遣使人晋朝贡。”另外,《晋书》卷九《帝纪九》记载:“(简文帝)咸安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王各遣使方物。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

⑤ 三上次男:《汉江地域发现的四世纪越州窑青瓷与初期百济文化》,《朝鲜学报》,81号,1976年;小田富士雄:《与越州窑青瓷同出的忠南百济陶器——四世纪百济陶器其二》,《古文化谈丛》,12号,1983年。

⑥ 权五荣:《四世纪百济的地方统制方式一例——以东晋青瓷的流入经纬为中心》,《韩国史论》,18号,1988年。

逻辑中加以理解,从而指出以青瓷为首的东晋文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百济中央势力向法泉里、花城里等地方势力赐授东晋物品的意图应当在于强化对于这些地方势力的控制。”除此之外,“赐授东晋文物还有加强政治统合、牵制新罗的目的”。按照这种观点的诠释,百济中央政权通过向地方首长分配、赐授东晋青瓷器,将地方势力统合起来,进而实现牵制新罗的政治目的。

就百济初期古坟、古墓的研究而论,林永珍有关石村洞古坟群小型墓中出土的东晋青瓷的考察值得关注^①。林永珍将石村洞古坟群的古坟墓分为积石冢系和土圹墓系两个大类,其中,积石冢系是百济前期(汉城期)统治阶层的墓葬,墓主为高句丽人,其王族属于温祚王系统。土圹墓规模较小,其被葬者不属于统治阶层,是与统治集团没有密切关联的土著民众。土圹墓、瓮棺墓、土圹积石墓等多种墓制的存在,则反映出土著势力内部身份等级的分化。另外,土圹墓、瓮棺墓等土著系统的墓制之中,有高句丽积石冢的异质因素渗透进来,从而导致葺石封土坟和土圹积石墓的产生。其中,葺石封土坟规模较大,被看做是土著集团中特权人物的墓葬。葺石封土坟周围出土有木椁,这显示出墓主与海洋的联系,年代上略晚于葺石封土坟、位置与其邻近的八号土坟墓出土有东晋青瓷。据此推测,这些土著势力利用海域交通,从较早时期就开始吸纳其他地区的文物。这种观点提示人们考虑汉江下游土著势力与西晋、东晋交流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关于韩国,特别是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器,20世纪80年代学界往往将之与百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之后,又有人将其理解为百济“中央”与“地方”统属关系的物化纽带^②。

三、百济故地出土两晋南朝陶瓷器的意义

关于东晋青瓷流入百济地区的意义,本文已对相关见解进行了概括。在此,拟在进一步整理已有论见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研究切入点。

首先,就百济前期(汉城期)而言,墓葬和城址都出土有西晋、东晋的陶瓷器,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古坟、古墓的出土资料,既包括以石村洞三号坟为代表的所谓王陵级古坟的遗物,也包括土圹墓、石槨墓之类小规模墓葬的出土遗物。但是,石村洞三号坟等筑有坟丘的古坟所出瓷器,均非出自埋葬设施内部,而是出自葺石及周边,其归属难以确定。另外,还必须考虑石村洞三号坟与东侧小型墓葬之间的先后关系以及墓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墓葬在时期上并无大的悬隔,它们都是墓域的组成元素。

梦村土城出土的西晋、东晋陶瓷器,大多来自特定遗迹之外的文化层,而出自特定遗迹的瓷器遗物,除少数发现于居住遗址,多数是窖穴出土的残片。梦村土城出土的瓷器残片达到几十片,而且器形多种多样,不仅有见于石村洞古坟群的四耳壶、盘口壶,还有瓷砚等稀见器种。总之,梦村土城所出两晋陶瓷器,在质与量上超过了石村洞古坟群的同类遗物。另

^① 林永珍:《石村洞一带积石系和土圹墓系墓制的性质》,《三佛金元龙教授停年退任纪年论丛》I,1987年。

^② 朴淳发:《汉城百济的诞生》,书景文化社,2001年,第215—247页;权五荣:《风纳土城出土外来遗物探讨》,《百济研究》,36号,2002年。

外,根据梦村土城窖穴等遗迹以残损状态出土的瓷器来看,这些瓷器应当在实际生活中被使用过。

在城址的具体考证方面,学界众说纷纭。许多研究者将梦村土城认定为河南慰礼城,无论如何,将梦村土城视为百济前期的一座王城应无大谬。另外,还需指出的是,至少到公元475年高句丽攻陷汉城为止,百济前期王城之一的梦村土城集中占有了相当数量的两晋南朝陶瓷器,与之对应,可能包含了百济前期王陵的石村洞古坟群则也埋纳有东晋瓷器。

关于墓葬出土的两晋陶瓷器,如果考虑到这些瓷器在埋入墓中之前保有、保管的场所,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推论,百济王和王族成员离世的时候,王城中的两晋陶瓷器会随之葬入墓中。另外,石村洞古坟群小型墓葬出土的东晋瓷器,本来也应是王城之中的集聚之物,后来分归各墓墓主所有。

我们可以对百济王都中国陶瓷器的流通模式做这样的描述,王城→王墓、王族墓;王城→王陵陵园内的小型墓葬。

那么,王都之外古坟、古墓中出土的东晋南朝瓷器状况如何?首先,应当探讨的是百济王都之外各地古坟出土东晋、南朝瓷器的数量。目前,还未发现可与王陵进行比较、对照的同期对等物。例如,武宁王陵出土的青瓷、黑褐釉、白瓷等南朝瓷器合计多达13件,与此相对,其他出土中国陶瓷随葬品的古墓、古坟(确实出于墓室和坟内),基本上都是1墓1件^①。石村洞三号坟东侧八号土坟墓的青磁四耳壶、法泉里二号坟的青瓷羊形器、花城里古坟青瓷盘口壶、笠店里一号坟青瓷四耳壶等等,均为单件形式出土。近年,龙院里遗迹出土褐釉盘口壶1件^②,水村里遗迹(一号土坟墓、忠清南道公州市)出土了青磁四耳壶^③。

王都之外出土中国陶瓷器的古坟之中,在所处地域与墓制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益山笠店里一号坟。笠店里一号坟是一座位于锦江下游的石室坟,崔完奎曾从石室墓墓主与百济中央势力之间关系的视角,对出土中国青瓷的笠店里一号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崔氏根据石室形态和出土遗物推定,笠店里一号坟属于5世纪末6世纪初,同时指出,笠店里一号坟反映着百济地方统治的状况。换言之,笠店里一号坟墓主身份,可以从“二二檐鲁制”这种地方统治制度中进行理解。关于“二二檐鲁”,《梁书·百济传》载曰:“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④

根据具体史料,南齐永明八年,即百济东城王一十二年(490年),百济向南齐上表,请求授予姐瑾等4人将军号,并请求赐授面中王、都汉王、遭卢王、八中侯等冠以地名的爵位。建武二年、东城王一十七年(495年)又上表请求授予沙法名等4人将军号,并请求赐授迈卢(罗)王、辟中王、弗中侯、面中侯等冠以地名的王、侯爵位。根据末松保和的推定,上述地名

① 门田诚一:《百济地方支配与中国陶瓷器——东亚册封、除爵与领域支配的考古学研究》,《贸易陶瓷研究》,13, 1993年。

② 公州大学校博物馆等:《龙院里古坟群》,2000年。

③ 忠南历史文化研究所:《公州水村里发掘调查指导委员会资料》,2003年12月10日。

④ 根据坂元义种的观点,5世纪晚期至6世纪初,汉城陷落之后,百济王都南迁并积极扩张新的领地,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之中新旧势力的浮沉拮抗也在进行,檐鲁制成为当时百济王族在地方发挥积极作用的保障手段。参见坂元义种:《五世纪“百济大王”及其王侯》,《古代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吉川弘文馆,1978年。

“分为北、南两组,北边一组位于全罗北道西北部,南侧一组位于全罗南道南部沿岸”。^①

由上述文献史料可知,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初,百济对于全罗南北地道区的地方统治有所加强。崔完奎推测,如果同意末松保和之说,将上述地名中的“迈卢”确定为“沃沟”的话^②,那么笠店里一号坟的墓主就应是该地区的首长迈卢王一类的人物,或者说,应是檐鲁制度之下的地方官。这样,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推论:笠店里一号坟出土的中国南朝青瓷或许是南齐向百济地方勋贵授封爵位时的附赐之物^③。

关于笠店里一号坟,尚有诸多具体课题有待探讨,例如,墓主是百济中央的派遣之臣,还是土著豪势?如何在檐鲁制的历史文脉中分析此墓资料?尽管对于这些疑问目前还无从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笠店里一号坟的考古资料对于研究百济政权南进以及地方统治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至少,从墓制方面来看,笠店里一号坟是该地区受百济中央势力显著影响的墓葬。与这种古坟出土中国南朝青瓷的现象形成对照的是,代表土著墓葬典型形制的全罗南道罗州播南面古坟群之中的大型瓮棺墓中从未发现中国瓷器,这一点的确耐人寻味。

汉城时期,中国瓷器主要出自百济王城及其附近包括王陵在内的墓地。作为这一规律的延伸,到了熊津时期,包括武宁王陵出土物在内的中国瓷器,一般为百济王、王族、高官、中央豪族以及受到中央政权左右的地方势力所拥有。据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在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初百济强化地方统治时期,南朝瓷器作为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器物,与墓制的变化一起反映出百济中央势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此外,还屡屡有学者将南朝瓷器视为百济中央势力分配的“威信财”物品来诠释其政治功用^④。特别是,如果将时代限定于汉城时期,根据中国陶瓷器集中于王城、出土于王城附近小型墓葬这一事实来推定,中国瓷器应该是由王城、王都向周边流通扩散的。因此,在王都及其周边的区域,中国瓷器作为一种带有政治性物品与王权关系密切。

另外,在同时期基层地方出土的南朝瓷器之中,法泉里古坟群出土的青瓷羊形器,作为器种独特的遗物值得关注。在下一节,笔者想通过中国青瓷羊形器出土状况的分析,来弄清这种器物随葬于墓内的意义,并希望借此脱离那种将中国瓷器视为百济中央控制地方的物质媒介的思维藩篱,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四、百济故地出土的青瓷羊形器与见于江南六朝墓葬中的使用方法

与百济王都出土的南朝瓷器相比,法泉里古坟群出土的青瓷羊形器器形十分特殊,器物

① 末松保和:《任那兴亡史》,吉川弘文馆,1971年。然而,其中有的王、侯冠以同一地名,而赐封时间又相隔不长,由此来看,可否将其视为实际的封地或封国,尚存疑问。不过,对于百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南齐在名义上支持其对这些地域实施统治。另外,坂元义种认为,向土著豪族赐封王侯爵位,不仅仅是将他们联合于百济政权系统之内的手段,也是百济积极征服各地的策略。关于檐鲁研究的学术史,参见山尾幸久:《朝鲜三国的军区组织》,朝鲜史研究会编《古代朝鲜与日本》,龙汉学舍,1974年;金英心:《5—6世纪百济的地方统治体制》,《韩国史论》,22,1990年。此外,关于檐鲁重要城邑的确定以及王族子弟的分据状况,参见李丙寿著、金思焯译:《韩国古代史》(下),六兴出版社,1979年;卢重国:《百济王室的南迁与支配势力的变迁》,《韩国史论》,4,1978年。

② 末松保和:《任那兴亡史》,吉川弘文馆,1971年。

③ 崔完奎:《韩国全北地方锦江河口的百济石室坟》,吉井秀夫译,《古文化谈丛》,27,1992年。

④ 朴淳发:《汉城百济的诞生》,书景文化社,2001年。

全长 13.7 厘米、高 12.5 厘米,最大宽度(臀部)7.7 厘米,器物表现的是羊曲足而坐的姿态,羊头有卷角,额部有一个直径约 1 厘米的圆孔,羊体中空。器表施青釉,浓淡不匀(图 1)。



图 1 法泉里二号坟青瓷羊形器

三上次男将这件器物与南京象山王氏墓群七号墓出土的青瓷羊形器进行了对比,象山七号墓墓主可能是死于永昌元年(322 年)的王虞,据此,法泉里二号坟出土青瓷羊形器年代应是 4 世纪中后期^①。

青瓷羊形器有两类,一类背部开孔,另一类额部开孔,法泉里二号坟器物属于后者。有人以此推断,羊形器应是作为烛台使用的^②,但是论据尚不充足。

法泉里二号坟出土的青瓷羊形器,可以作为推断百济坟墓年代以及伴出陶器时期的依据。另外,这件器物也是探讨百济与中国南朝政治关系的重要资料。

青瓷是三国东吴至江南六朝时代丧葬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众所周知,这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瓷器物。然而,关于羊形器的出土状态和墓内位置,可资考察的实例很少,下文以法泉里羊形器为参照进行探讨。

南京西岗西晋墓是一座多室墓,平面 3 个墓室和 1 个后室组合为丁字形。每个墓室埋葬 1 对夫妇,合计埋葬 3 对夫妇。每个墓室的入口都有砖砌的祭台,另外,在位于正中且与各墓室相连的前室的东南角,出土有青瓷“神亭壶”(或称谷仓罐、堆塑罐、魂瓶等^③,本文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叫法,称之为“神亭壶”)。其基本器形为壶(罐),上部饰有多层的建筑、

① 三上次男:《汉江地域发现的四世纪越州窑青瓷与初期百济文化》,《朝鲜学报》,81 号,1976 年。另外,可以与法泉里器例进行比较研究的器物,除了三上次男所举之例,还有浙江省金华市古方据称为东晋墓葬的二号墓(M2)所出青瓷羊形器。但是,该器物在墓内的出土位置未被说明。详见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 年第 9 期。

②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256 页;罗宗真:《南方制作的青瓷器》,《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年;中村圭尔:《江南六朝墓出土陶甕的考察》,《中国中世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 年。

③ 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 年第 3 期。

人物和动物雕塑,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器物。这种器物流行于东吴至西晋,分布地域集中于江南地区,均出于墓葬,足见其用途和性质比较特殊。

关于“神亭壶”的分类和年代,学界已有先行研究^①。其中,根据小南一郎所做的出土地域及其时代背景的考察,随葬这种器物的墓葬的分布区域局限于建康(东吴称为建业,即现在的南京)至吴郡(今苏州一带)的长江下游以及浙江各地。三国时期,吴郡与会稽郡均属东吴领地,世居于此的土著豪族重视丧葬礼俗。^②这一观点强调,使用“神亭壶”的埋葬习俗主要盛行于东吴境内当地性较强的基层社会当中。在南京西岗西晋墓中,青瓷羊形器被放置于本地文化色彩浓厚的“神亭壶”的西侧(图2、图3)。从位置关系推测,在该墓的丧葬仪式中,羊形器与“神亭壶”有密切关系。



图2 南京西岗晋墓青瓷羊形器

青瓷羊形器在墓内出土位置明确的实例很少,南京象山七号墓是年代晚于南京西岗西晋墓、青瓷羊形器出土位置明确的墓例,该墓出土的青瓷羊形器可以与法泉里器例进行对照探讨。除了形制特征可资比较之外,墓主身份也值得注意。根据简报的推定,墓主是死于永昌元年(322年)的王虞,与书圣王羲之系出一族^③。除了墓主一族家世及其在南朝的社会地位之外,还应关注一些墓葬细节:墓门口处放置陶制条案,青瓷羊形器出土于条案东侧。该墓年代在西晋之后,未出土神亭壶,而是在砖砌祭台的位置放置了陶制条案(见图4)。

根据小南一郎的论文,这种陶制条案是东晋以降常见的器具,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继承了东汉中原丧葬礼俗传统的招魂祭具。随着这种祭祀死者方法的盛行,江南土著豪族沿袭的使用神亭壶的丧葬礼俗趋于废绝。倘若接受小南的观点,那么可以推断,象山七号墓陶制条案与羊形器的位置关系应是南京西岗西晋墓的祭台与青瓷羊形器之间位置关系的投影。

毋庸赘言,东晋王氏原本世居琅琊,是被称为北人的北来士族,也是东晋最大的士族集

① 冈内三真:《五连罐与装饰附壶》,《古代探丛》2,1985年;长谷川道隆:《吴晋(西晋)墓出土的神亭壶——以系谱及类型为中心》,《考古学杂志》,第71卷第3号,1986年。

② 小南一郎:《神亭壶与东吴文化》,《东方学报》,65,1993年。

③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五号、六号、七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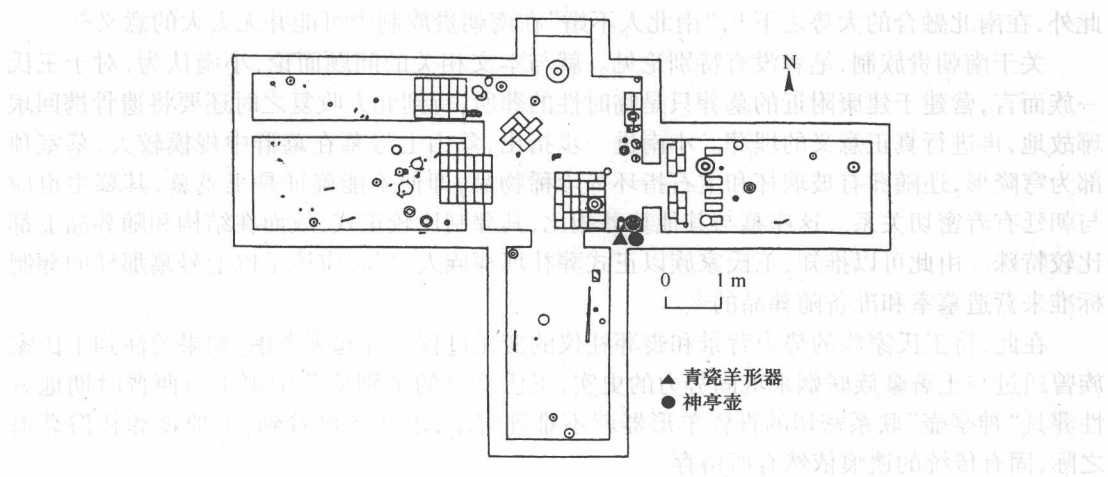


图3 南京西岗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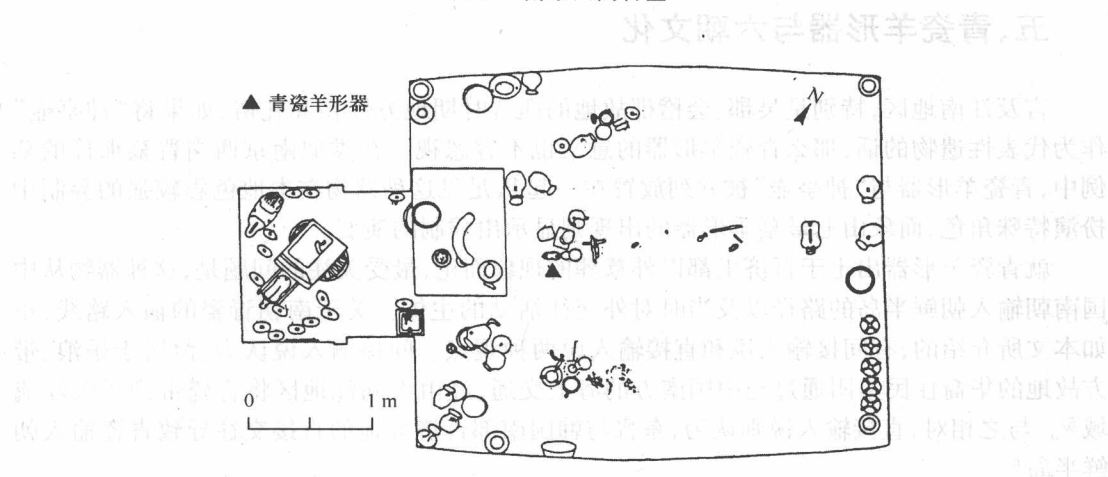


图4 南京象山七号墓

团之一。有观点指出,王氏族中亦有像王闳之那样与江南土著豪族联姻,以此壮大自身势力者^①。但也有人认为,王闳之自身属于王氏家族中门第较低的一支,而与其联姻的吴兴施氏也并不十分有名^②,故而难下论断。曾有学者认为,“南北人不婚”,即江南土著豪族与北方移民之间互不通婚,这是南朝贵族制形成的关键所在^③,而且这也保证了北人的地缘性和政治社会的优越性^④。但有人也认为,“南北人不婚”局限于上层士族,一般庶民不受此限^⑤。

①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五号、六号、七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② 中村圭尔:《墓志铭所见南朝婚姻关系》,《六朝贵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

③ 冈崎文夫:《关于南朝贵族制起源至成立的经过的若干考察》,《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弘文堂,1935年。

④ 越智重明:《东晋贵族制与南北“地缘”性》,《史学杂志》,第67卷第8号,1958年;越智重明:《南北士人之间的不通婚》,《魏晋南北朝贵族制》,东京:研文出版社,1982。

⑤ 越智重明:《南北士人之间的不通婚》,《魏晋南北朝贵族制》,东京:研文出版社,1982年。

此外,在南北融合的大势之下^①，“南北人不婚”在南朝贵族制中可能并无太大的意义^②。

关于南朝贵族制,笔者没有特别论见。就与本文相关的问题而论,小南认为,对于王氏一族而言,营建于建康附近的墓葬只是临时性的葬所,待到北方收复之时还要将遗骨携回琅琊故地,再进行真正意义的埋葬。小南进一步指出,象山七号墓在墓群中规模较大,墓室顶部为穹隆形,还随葬有玻璃杯和宝石指环等珍稀物品,即便不能确证是王虞墓,其墓主也应与朝廷有着密切关系。这座墓与其他墓葬相比,其葬制比较正式,故而在结构和随葬品上都比较特殊。由此可以推知,王氏家族以正式葬礼埋葬族人之际,应该是以七号墓那样的葬制标准来营造墓室和准备随葬品的^③。

在此,将王氏家族的势力背景和丧葬礼仪的变化过程结合起来考虑,如果关注到王氏家族曾通过与土著豪族联姻来巩固势力的史实,王氏墓群的个别墓葬中出土与西晋时期地方性葬具“神亭壶”联系密切的青瓷羊形器就不难理解了,由此还可看到,本地丧葬礼俗衰退之际,固有传统的遗痕依然有所留存。

五、青瓷羊形器与六朝文化

言及江南地区,特别是吴郡、会稽郡故地的两晋时期地方性丧葬礼俗,如果将“神亭壶”作为代表性遗物的话,那么青瓷羊形器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在类似南京西岗晋墓那样的墓例中,青瓷羊形器与“神亭壶”被并列放置在一起^④,足见这种器物在本地色彩较强的葬制中扮演特殊角色,而象山七号墓羊形器的出现则显示出葬制的演变。

就青瓷羊形器出土于百济王都以外墓葬的现象而论,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器物从中国南朝输入朝鲜半岛的路径以及当时对外交往活动的主体?关于南朝青瓷的输入路线,正如本文所介绍的,有间接输入说和直接输入说两种观点。间接输入说认为,留居于乐浪、带方故地的华裔住民集团通过与中国南方的海上交通,经由大同江地区将青瓷带到了汉江流域^⑤。与之相对,直接输入说则认为,东晋与韩国南部百济等地的直接交往导致青瓷输入朝鲜半岛^⑥。

另外,关于汉江流域中国瓷器向地方基层扩散的问题,有人认为,法泉里古坟群、花城里古墓(出土青瓷盘口壶)等地方性遗址所出中国瓷器是通过与东晋有交往关系的百济王权间接获得的。还有人则认为,修筑法泉里古坟、花城里古墓等墓葬的地方势力与东晋有直接联系,并直接从东晋获得了这些瓷器。

梦村土城被视为百济前期王城之一,该城址出土了大量两晋瓷器。其中,出自遗迹的中

① 矢野主税:《东晋南北人对立问题——其社会意义的考察》,《史学杂志》,第77卷第10号,1968年。

② 中村圭尔:《墓志铭所见南朝婚姻关系》,《六朝贵族制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此外,关于其研究动向的整理,参见山中浩:《关于东晋政权与南北人问题的研究动向》,《广岛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报告》15,1993年。

③ 小南一郎:《神亭壶与东吴文化》,《东方学报》,65,1993年。

④ 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第3期。

⑤ 金元龙:《原城郡法泉里石椁墓与出土遗物》,《考古美术》,120,1973年;金元龙:《作为百济建国地的汉江下游》,《百济文化》,七、八,1975年。

⑥ 三上次男:《汉江地域发现的四世纪越州窑青瓷与初期百济文化》,《朝鲜学报》,81号,1976年;小田富士雄:《与越州窑青瓷同出的忠南百济陶器——四世纪百济陶器其二》,《古文化谈丛》,12号,1983年。